

“《秦汉社会生活四十讲》，读来趣味盎然，故事性、知识性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一部大众通俗化的佳作，是一次学术内容大众化的新的尝试。”

著名秦汉史专家、博士生导师朱子彦先生鼎力推荐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秦



社会生活



【图文典藏版】

汉



从文化源头上追寻华夏先人足迹
于历史细微处再现秦汉生活图卷



王凯旋
著

秦 漢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汉社会生活四十讲 / 王凯旋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0195-921-8

I. 秦… II. 王…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秦汉时代
IV. K23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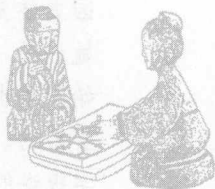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4216号

秦汉社会生活四十讲

作 者 王凯旋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捷迅佳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毫米 16开
印 张 17.7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921-8/K·149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凯旋先生嘱我为其新书《秦汉社会生活四十讲》作序。拜读之下，感觉其著作虽是写两千年之前的秦汉之事，但内容大多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生活，具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气息，大有虽越千年而毫不陌生之感，故欣然为之序也！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研究渐出“象牙塔”，开始走向社会、反馈众生。引领潮流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半娱乐性的学术，或称“娱乐学术”，即在大众化学术的同时，将学术作为取悦受众的一种媒介；另一种是“大众学术”，是将学术语言转变为大众语言，并用较为浅显通俗的方式来实现这样的转变；前者如易中天、于丹为代表，将学术回归社会，走了平民化、大众化的路线，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后者也是一种大众化，不过是学术的大众化，凯旋先生在其大作中，就这一方向做了有益的探索。

在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人是十分重视社会生活的。如《诗经》中就有大量先秦时期不同阶级、阶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资料。大凡邑聚分布迁徙、氏族部落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姻、祀神祭祖、风尚礼俗、娱乐教育等等，在《诗经》中均有披露。在《周易》中，则记载了先民的生老病死、社会构成、商旅交通、人际交往、穿着时尚、卫生保健、宗教信仰、水旱灾害等生活细节。《十三经》中的《礼记》《仪礼》，对古代社会的宗庙、祭祀、丧葬、婚规族礼、养老教子、起居仪节、服饰冠冕等均有较为翔实的记载。从隋唐开始直至明清，这一时期的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之中，有关社会生活史的内容则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然，这些都是古人的零星记载，尚不能构成

一门完整、系统的学科。

社会史和文化史先后在传统史学领地上突兀而起，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变革的两大标志。与文化史相比较，社会史似乎略显得有几分拘谨，毕竟她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即使在社会史研究比较发达的西欧、北美，其兴盛也始于本世纪中叶。目前社会史很容易被界定为历史学的一门专史或分支，但这需要斟酌。因为这样的界定可能会简化社会史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冲淡其对传统史学叛逆的意义，从而使之沦为传统历史学的附庸。

中华民族心理走向成熟并趋向稳定的历史时期就是秦汉帝国阶段，中国现有的生活方式，很多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缩影。对于秦汉史学研究，一向以政治、经济史研究为多，社会生活作为秦汉史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最近则呈现出勃勃生机。例如，对秦汉社会的研究，已在社会环境、社会风俗以及社会关系等领域，出现了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如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李振宏的《居延汉简与秦汉社会生活》均可谓秦汉社会史综合研究的力作，不仅内容丰富，在论述上亦颇多新意。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从气候、水资源、野生动物的分布、植被、秦史灾异记录、汉代海溢之灾、南方瘴气之害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的条件。

上述著作均开辟了秦汉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但由于其专业性较强、学术性较高，对大众读者群体构成了一种阅读上的障碍。王凯旋先生的《秦汉社会生活四十讲》一书着力突破这种障碍，但亦不因此而降低其学术价值。

王凯旋先生多年来从事秦汉社会生活史方面的研究，这就涉及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里我想谈一点有关这一问题的个人看法：

社会结构和逻辑上的概念，使得社会被遮蔽在国家形态中是一种常见现象，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指出的：“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他领域都不包含在内。”这就说明，在古代，国家支配了社会的一切，社会沦落为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色。

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后，这种现象才有所改变，民主人权思想开始传播，人们对于社会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社会契约论是16世纪以来形成于西方国家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影响的一种国家形成假说。这种假说是以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为前提，但无论是立论者自身的假定还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一种大体自由平等的社会状态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们的共性在于有社会而无国家，此种挑战传统的意识，在思想大争鸣时期才能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也有这样的类似特质。

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全面推行了郡县制和官僚制，并进行了整齐划一

的国家制度建设。在国家和社会意识的筹建过程中，统一了文字、法律、历法、货币、度量衡等，并修建了全国的道路和长城等边境防御系统。商鞅的法家思想和韩非子的“明主之国”，在秦始皇的手中，终于得以实现。秦始皇为了大规模的集权，坑杀了不肯合作的儒生，并运用国家机器，试图将触角伸进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甚至于“偶语者弃市”。大秦帝国高度的社会国家化和国家对社会强烈的控制欲，在中国历史上无出其右。但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陈涉等人很快就揭竿而起，貌似铜墙铁壁的大秦帝国在几年间便走向终结。秦朝的国家机器并未能够全面掌控社会，秦始皇所设想的干预社会政策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朝廷所具备的雄心和秦朝薄弱的经济社会基础完全不成比例，它实际上不具备全面干预社会的能力。

社会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却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左右着国家的选择和前进方向。秦帝国国运短祚，其留给后世的中央集权体制却影响深远，同时也留下了试图全面干预社会而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紧张的惨痛教训。秦之后的汉代，为避免重蹈覆辙，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采取了“无为而治”政策。秦汉两代的一弛一张，形成了华夏两千多年较为稳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对中华文明的延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们奉尧舜禹时代为圣贤之世，主要是因为那时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结构，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完全合二为一，实现了家国一体，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一致性。秦建立后，治国如家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对三代的怀念，被当作一种崇高的理念为后世传颂。历史上那些为人称道的官吏经常被褒之“爱民如子”的美誉，原因就在于此。于是，有了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地方的管理，常有几十万人的区域，由不足一百人的官吏来控制，而控制的方式大多是靠意识形态、传统道德、风俗习惯等，而不是专制传统中的暴力因素。这样的一些例子，在中国的古代作为范例宣扬，但是奇怪的是，国家权力并没有深入到基层社会，而基层良好的社会秩序主要是依靠普遍的自律性和自治性，这对于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一种很好的启示。

汉帝国初期，注意汲取社会“控严而乱”的教训，所以，汉初的“无为而治”成为社会群体所理想的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契约。今天，我们再一次审视秦汉社会生活，会使我们对于两千年前的社会生活及其运作有一个感性而形象的了解。王凯旋先生的《秦汉社会生活四十讲》，通俗明了地为我们凸现了秦汉社会生活的显性特征，归结起来，我认为该书有以下特点：

一、内容翔实全面，堪称是一部解读秦汉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该书内容立体、直观，将秦汉社会生活分门别类地叙述。例如政治层面的选举制度、博士

官、刑法、官吏惩治、酷吏；经济层面的官商、城市、交通、农耕、渔猎、养马、制盐、造船；社会文化层面的市井百态、酒文化、住宅、婴儿教育；社会风俗层面的婚俗、丧礼、饮食；女性及礼仪方面，如女子的梳妆和化妆品、服饰，并涉及医药卫生等领域。可谓面面俱到，记述翔实。

二、学者著书向来严谨并以学术化语言呈现，该书作者在秦汉生活这一常人认为较为刻板的纯学术领域，用自己的“文化通俗观”理念，进行了一次学术内容大众化的新的尝试。

三、全书洋溢着一种“平民情结”，作者将视角投入广大的社会底层，反映基层民众生活、反映社会百态。

四、该书的学术价值亦不容忽视。秦汉距今遥远，相较于明清，秦汉社会生活的叙述，在资料上和关注度上都不是所谓的“热点”。作者是花了大量的力气，在资料上旁征博引，站在了秦汉社会研究的制高点上。另外，作者还十分注意吸收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就使该书的学术含金量大为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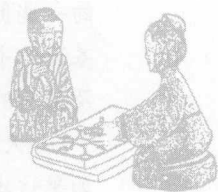
五、文字特点上，该书行文朴实，文字功底扎实，史学语言和大众语言能够融会贯通。既因袭传统的治史风格，注重考据，又兼顾一般的读者群，语言平实、贴切。

王凯旋先生的《秦汉社会生活四十讲》，读来趣味盎然，故事性、知识性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一部大众通俗化的佳作。希望作者今后有更多更好的社会史方面的书问世，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社会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朱子彦

戊子年孟夏写于沪上寓所

自序



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辉煌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期和成熟期。秦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几乎全部内容都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发展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二千余年的中国文化。反映这样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多层面、多人物和多领域，是真实了解和全面学习秦汉历史的必然要求。

秦汉社会生活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从秦汉时代留存下来的各类文献资料以及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材料来看，我们都有可能做到尽可能多地，至少是部分地对秦汉社会的文化生活层面进行学术性的探讨、研究、复制和描述。这种工作即是将我们的学术研究做普及和大众宣传，但这种普及工作不是离开历史或离开学术的戏说和游谈，而是要尊重历史，言之有据。不如此，我们所做的一切就谈不上有任何一点真实性可言，更不要说什么学术价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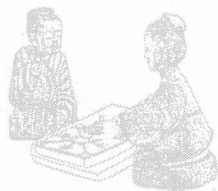
本书所涉及题目包括秦汉时代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各阶层人士的日常生活，反映秦汉时代的有关民俗民风等亦在此中。书中多处参考并大量引用了许多专家的成果，如林剑鸣等先生所著《秦汉社会文明》、孙机先生所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杨树达先生所著《汉代婚丧礼俗考》、乔伟先生所著《秦汉律研究》、熊铁基先生所著《汉唐文化史》、余华青先生所著《中国宦官制度史》、完颜绍元先生所著《流氓的变迁》等。鉴于该书系面向大众读者的通俗学术读物，故从全书体例和相关条目的写作要求出发，没有一一列举所引成果。

书中的图片资料主要来源于孙机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书和

志远先生的《四川汉代画像砖和汉代社会》、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查瑞珍先生的《战国秦汉考古》等书。在此基础上，也有许多内容是我多年来思考和研究的一些问题。有些还很不成熟，算是研究秦汉史的一点心得。这本以杂谈形式为基调的书稿是笔者试图向大众读者做一些秦汉史、特别是秦汉社会生活史学术普及工作的一项粗浅的尝试。故此，疏漏与缺失一定不少。

“天道酬勤”，对秦汉史的学习也是如此。我自视学历不深，惟愿以勤补拙，如果这本书稿能够让读者朋友们对秦汉历史唤起更浓厚的兴趣，即使回过头来批评有加，也仍是值得去做的。在学术的道路上，争鸣的诤友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一笔宝贵财富，愿读者诸君赐教，言祈心诚。

目录



- 第一讲 秦汉士人与士风 >>>>> 1
- 第二讲 秦汉的博士官 >>>>> 10
- 第三讲 秦汉宦官面面观 >>>>> 15
- 第四讲 秦汉惩治官吏的法律 >>>>> 20
- 第五讲 秦汉的刑法与刑徒 >>>>> 27
- 第六讲 秦汉时代的城市 >>>>> 35
- 第七讲 秦汉时代的边塞 >>>>> 45
- 第八讲 秦汉时代交通和交通工具 >>>>> 48
- 第九讲 汉代选举制度 >>>>> 66
- 第十讲 汉代的官商 >>>>> 73
- 第十一讲 汉代的酷吏 >>>>> 78
- 第十二讲 汉代的流氓 >>>>> 84
- 第十三讲 汉代市井生活 >>>>> 90
- 第十四讲 汉代农耕生活 >>>>> 97
- 第十五讲 汉代渔猎生活 >>>>> 107
- 第十六讲 汉代谣谚与世风 >>>>> 112
- 第十七讲 汉代的船与造船业 >>>>> 122
- 第十八讲 汉代养马和相马 >>>>> 126
- 第十九讲 汉代的货币 >>>>> 132
- 第二十讲 汉代的婚姻法 >>>>> 140

- 第二十一讲 汉代婚俗浏览 >>>> 145
- 第二十二讲 汉代的胎儿教育 >>>> 152
- 第二十三讲 汉代丧葬习俗 >>>> 156
- 第二十四讲 汉代饮食漫话 >>>> 164
- 第二十五讲 汉代人与酒 >>>> 173
- 第二十六讲 汉代制盐业 >>>> 180
- 第二十七讲 汉代的住宅 >>>> 185
- 第二十八讲 汉代人的审美观 >>>> 193
- 第二十九讲 汉代家具与家庭装饰 >>>> 199
- 第三十讲 汉代的服饰 >>>> 207
- 第三十一讲 汉代女子梳妆和化妆品 >>>> 214
- 第三十二讲 汉代娱乐生活 >>>> 219
- 第三十三讲 汉代的杂技 >>>> 226
- 第三十四讲 汉代的文具品 >>>> 234
- 第三十五讲 汉代的书籍 >>>> 243
- 第三十六讲 汉代地图概说 >>>> 247
- 第三十七讲 汉代日用杂品 >>>> 252
- 第三十八讲 汉代的灯具 >>>> 256
- 第三十九讲 汉代医药和医学 >>>> 261
- 第四十讲 汉代兵器杂说 >>>> 266

第一讲

秦汉士人与士风



秦汉士人，即通常所说的读书人，是秦汉时代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人员素质相对较高，文化底蕴也比较深厚，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所出现的问题既关注又十分敏锐，并在社会上以立言立说阐述和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秦汉间的这一批士子文人在他们自己的精神领域和内心世界里极富个性化，他们或在朝，或在野；或讲学游宦，或落拓不羁。他们的言行和思想意识对秦汉两代的政风、民风都有深刻的影响，秦汉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继承者和创新者。



秦汉时代的这一批读书人在个人性格特征、情感思维、身世经历、道德追求、生活理念、待人处事以及所持学术观点、为政信仰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士人忧国忧民的心理特征则是普遍共有的。秦汉士人很少将自己锁定在书斋文札中，他们把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诗文著述看做是社会的学术和政治的学术，因而在秦汉流传下来的许多文献里很少有宋儒那样嗜谈性理的言辞，即便像《史记·天官书》那样的纯天文学著作也无不涉及社会政治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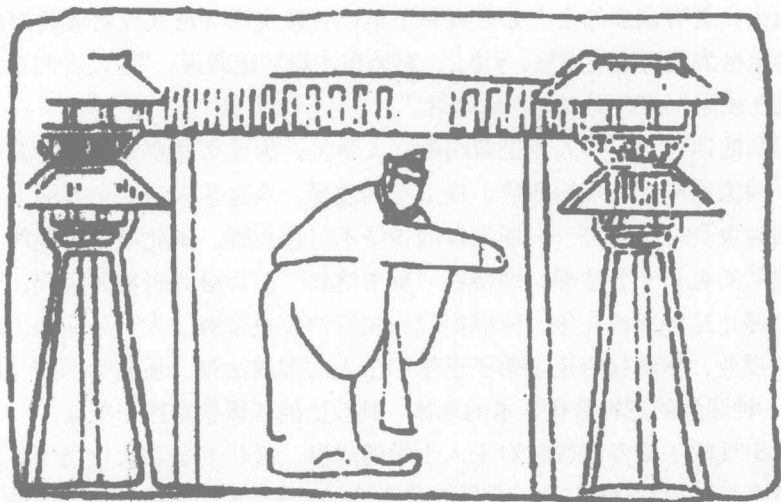
因此秦汉士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评说世事，纳言献策。其学术目的之明确，论世事之尖锐，参与政治之热情为中国历代所少见。正因为如此，士风在秦汉两代的影响也就非常广泛而深刻。

一、秦代的士风

秦代是中国统一专制王朝的开始，从秦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是皇帝家天下的时代。皇帝一人说了算，政权专制垄断了一切，士人在其间的作用是以维系专制皇权的需要来衡量的。

秦政权用“五德终始说”中的水德作为立政的根本，水德主刑杀，因此崇尚先秦以来的法家思想，以严刑峻法贯彻其政治统治，所以士人中学法家一派的李斯便得到了秦始皇的欣赏。当然李斯主张法家治秦也并不是秦朝建立以后的事，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时期就已经如此，李斯也因此由士学之路踏上了仕宦之途。李斯在秦统一后曾做了对中国历史来说是大大的一件好事，这就是他同群臣的辩难中坚持实行郡县制，反对分裂割据的分封制，并为此后实行的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项措施出了力、立了功。但他为维护皇权，抑或说他慑于皇权的淫威，由一个读书人回过头来残灭文化，尽焚诸子百家之书，最终也没能逃脱专制王朝政治斗争殉葬品的命运，并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秦末的政治角逐中，李斯为谋求一己之利并保全政治荣耀，俯首低眉于邪恶的宦官赵高，但最终还是赵高要了他的命，这是作为丞相李斯的悲哀，更是作为士人李斯的悲哀，一个软骨士人应有的悲哀。

秦代有相当一些知识分子为求生存之路和显达地位而屈身于皇权门下，对皇权的代表者皇帝本人极尽谄媚阿谀之能事。秦代建立不久，就有几十名博士联手像啦啦队一样在宫中颂秦始皇的“功德”，其过谀之甚，读者一阅便知。他们明知在助纣为虐，却不愿人们把它说出来，政治士人的心态之诡、情感之复杂正是秦代士风一个方面的反映。



◎ 秦汉士人图

秦汉士人是一个知识群体，汉代选官的主要来源即出于此。其中，秦汉两代的博士官构成了朝内士人的重要代表。

虽然如此，但是秦代的读书人并不尽如李斯的为人，秦代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不愿或拒绝为当朝出力。他们隐姓埋名，寄居乡野，游学论世，诗文言志。一个客观的结果就是尽量不使自己的踪迹被秦政权的鹰犬们发觉，三世相韩的张良即是这样的士人。秦代的这一批智士学人并非不想参与政治，但“良禽择木而栖”的理念以及能够代表和反映他们学说意愿的政治领袖的出现却是决定他们是否出仕的前提条件。秦代的两届皇帝都不是这样的人选，因此秦代士风中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的沉寂。在中国古代各朝历史中，大批士人远离政府而退隐于民间，秦代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在朝任职的博士官们也只是充作政权装饰的门面以及备作皇帝典章文赋的顾问，如此而已。从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秦代的各类文献中，都很少可见士人的身影。秦代的士人在民间，秦代士风的源头也在民间。秦代专制独裁的政治统治，使得许多身怀硕学的士人远离秦政权而深藏于民间或乡野。“士为知己者死”曾是先秦士人的一条名训，但这样的名训在秦代的政权中却再也难见。

秦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人视暴政为仇敌，前面所说三世相韩的张良就曾计划在秦始皇出巡的路上截击他并“椎杀之”；秦皇帝东巡即遇“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书，甚至也有人以求长生之名套走了秦始皇的大批钱财，尔后又对秦皇帝大骂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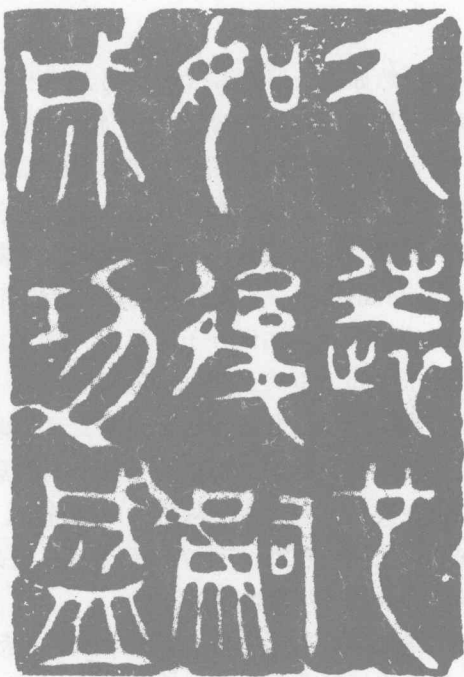
通扬长而去；更有众多的士人公开或私下里以言谈文章等形式反对秦政权的残虐无道。秦始皇为此而恼羞成怒，《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这犯禁的四百六十多人正是秦朝的文人学士。为什么非要置这些士人于死地不可呢？因为这些士人攻击政府，攻击专制残暴。杀这些人是给更多的士人一个信号，同时也是一个警告——即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由此可见，秦代士风中反专制残暴的色彩十分浓烈，即便在“焚书坑儒”以后极其恐怖的时代，士人也仍然没有停止这种反抗斗争，所以秦代的先后两位皇帝对士人十分痛恨。学术历来是师承授业，秦政权否定了弟子求学于士人的客观法则，强制学子们“以吏为师”，用一种强盗的逻辑替代学术的规律，其政治的荒谬愚蠢达于极点。

它突出反映了秦专制政权对士人士学的恐惧。汉代的学者伏生当年曾在家中墙壁内藏有被禁毁的《尚书》，说明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还是敢于冒杀头的风险来保存文化火种的。而且像伏生一类的士人，当也不在少数，否则就无法解释当西汉惠帝“除挟书律”后，会有那么多的先秦文化典籍能够在民间重现这样一个事实。

秦代士人在等待时机，这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就是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反秦大起义。

值得注意的是，秦末各路反秦义军中，都有为数不少的士人出现，这种一夜之间士人突现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内中深刻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士人慕名投军，参佐军务，枢办行政，积极地为新政权出谋划策，摇旗呐喊，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士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特别是作为一个智士集团，已成为覆亡秦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这些士人中有许多是来自于六国旧贵族的后裔，每个人的主观动机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各有不同，但士人与反秦义军的携手，却无疑是建立在推翻暴政的共同基础之上。秦在立国后曾力克山东六国，其时士人云集，游说东方，张仪、范雎之属皆为



◎ 秦之罘刻石

此图为秦始皇东巡芝罘所刻文字，内容多为颂扬秦始皇之功德。

秦所用，势力之大，锋芒之锐，无人无国可挡。但在秦朝建立的十五年后就急衰直下，表明秦政权昔日的活力已不再现。司马迁在总结秦朝败亡时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政权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作为政权建设基柱的知识分子的支持。

秦代士风在秦代的腥风血雨中始终昂扬着正义和进取的雄姿。它不同于商业时代的文人群体，中国传统的儒家风范和人格理念是秦代大多数士人的最高追求目标，名利观念也由此而被大部分读书人视为浮云。这种文化精神和价值的存在就决定了秦代士风的社会走向。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篇中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

反抗暴政是秦代士风始终唱响的一个主旋律，由此而深刻地影响了秦代的政风和世风。摧残文化、摧辱士人的统治者从来不可能坐久天下，秦代存亡的事实足以成为历史的鉴戒和写照。正如司马迁所说：“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汉代的士风

汉代，实际包括了西汉和东汉两个王朝阶段。从整个汉代历史来考察，士风的变化和表现呈现出巨大和多样的特点。与秦代不同的是，士人在汉代参与政治的热情比较高，分属于各学派的士人利用不同的场合和渠道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和对社会时事的关心。伴随两汉外戚、宦官、党人、太学生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士人群体也充分地参与其中，在社会政风、民风、世风等许多方面都处处表征着汉代士风的影响，士风也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发生着深刻而微妙的变化。汉代士风的政治民主色彩也愈显浓重，对汉末政治腐败的抨击表明汉代的士人阶层忧患意识的强烈。汉代士人的忠君思想比较浓厚，它成为汉代士风维护皇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砝码。随着汉代社会商业意识的高涨，汉代士风的吹拂也散发出商业市场的气息。因此就汉代的士人和士风而言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时代和社会变化的精神意识。

汉代士人参与政治的活动贯穿了汉代存亡的始终。汉代的皇帝比起秦代的皇帝来也比较尊重当世的士人。刘邦原为一介村夫，但他在建立汉帝国后，还是懂得知识分子在政权建设上的作用的，所以他启用学人叔孙通来制定礼法，汉高祖对士人的礼遇固然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为士人参与政治活动开了



方便之门。在西汉初年的中央政权里，士人的比例明显地高于秦朝，如张良、陈平、陆贾、贾谊、酈食其等人都是饱学之士。西汉初年的许多大政方针的制定都离不开士人的积极和努力。刘邦之后的惠帝颁布“除挟书之律”，事实上等于否定了秦代的焚书之举。文、景两皇帝和西汉武帝也在尊礼士人的同时，进一步开放了学术空间，儒、道、墨、法各家学说又相继兴起。但在汉代，基本的学术倾向还是儒道并行，虽然武帝时“独尊儒术”，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强力限制各派学术的自由发展，更没有采取极端的恐怖手段。立于政府学官的儒学是汉代所倡导的“国学”，没有立于学官的各家私学还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学术保留并传播的。所以汉代士人中的私人讲学之风很盛，门徒弟子也很多，特别在汉代地方藩王和豪强地主接纳士人充当谋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私学的发展实际是很快的。

《西京杂记》记载说：“河间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河间王礼贤士人，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生活标准不能超过宾客士人。可见汉代已大有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由此使士人为报知遇之恩而投身政治和社会活动，汉代的士人也就不再沉寂了。

汉代前七十年的历史中，官私之学都比较活跃，它比较秦代“以吏为师”的法家一学，其学术氛围自然相去甚远。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西汉前期的士风就表现为积极进取的学术意识和士人参政议政的主动精神。从西汉的相关史料考察，汉代士风的这一特点基本是一以贯之的。

西汉初年相继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代表，如长沙王太傅贾谊，如太史令司马迁，如博士官董仲舒等。他们针砭时政，言辞尖锐，对汉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论阐述。汉代的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发展比较有利，除东汉后期宦官干政，排斥异己、剿杀士人外，各代皇帝从总的来看，对学术、学派的活动并不横加阻挠。

故此，两汉时期学人辈出，如刘向刘歆父子、张衡、司马相如、东方朔、匡衡、贡禹、蔡邕蔡文姬父女等。《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了东汉一朝著名的儒林学士就达二十四人，这也是仅就充任政府学官的人来说的。大量的在野或于民间游学之人以及后学传习者尚不在列传之中。这样众多学人的出现是汉代文化繁荣的基石和保证。

西汉时期的学人大多具有为民请命的精神意识，在有关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关系汉代民人经济政策的制定、商讨、确立和实施的各个不同阶段，汉代学人都以高度的忧患意识上书直言，痛陈时弊，使这一时期的基本政策大致保持在比较有利于民人的水平上。这一时期的士风也呈现出比较健康向上的势头。在西汉年间反对地方封国割据，揭露酷吏贪残虐民之事以及豪强地主侵吞民人土地和官